

陶铸(中)

●宋德辉



辽吉省委部分领导干部合影(前排左起:夏尚志、陶铸、邓华)

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,陶铸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创建和坚持根据地的根本保证来抓。

1946年1月1日,陶铸在辽西省委扩大会议上说:“在建立革命根据地过程中,要将通过发动群众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,再加上培养教育,成为建设革命根据地和各方面斗争的骨干。”他还强调说,“党组织的发展和本地区干部的涌现,是一个根据地的成长和巩固的重要标志。”由于指导思想明确,各地在创建根据地一开始就重视这项工作。按照省委“突破一点,就地生根”的要求,对在反奸清算剿匪反霸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养,个别发展,并逐步建立起党支部和党小组。截至1946年秋,在辽西法库、康平、昌图、双山、郑家屯、黑山等地发展了农民党员千余人。在铁岭县发展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入党,在阜新敌占区还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并建立了秘密党支部。新党员的大量发展,引起陶铸重视。他找到《胜利报》编辑说:“现在发展了大批新党员,不教育怎么行,你可参考刘少奇的《论党》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,编写一本《怎样做一个好党员》的课本。”初稿写出后,经陶铸审阅、修改、定稿,很快印发到基层党支部,作为新党员的学习材料。不久,省委又指示各地都要开办党校和训练班,分批轮训新党员。与此同时,陶铸还十分重视培养党的地方干部。1945年12月,他在分析形势时说:“目前敌强我弱,我们刚刚到东北,脚跟未站稳;伪满14年殖民地奴化教育,加上国民党的反共欺骗宣传,东北人民对我党不甚了解。我们和国民党斗争能否胜利,根据地能否建立起来,关键是争取群众,发动群众,依靠群众,而改变现状,深入工作的决定因素是干部。”他说,在东北创建革命根据地,战胜国民党反动派,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。为此,要注意争取团结教育东北青年知识分子,培养地方干部。只有这样,才能站稳脚跟,战胜困难,发展壮大革命力量。他在辽吉军区政工会议上也强调:“必须从本地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大批新干部,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与辽吉人民有血肉联系,作为辽吉人民子弟兵才更有根基。”不久,省委就在法库成立了辽西民主学院,采取延安抗大式的教育方法,短期轮训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干部。陶铸经常到学院讲课。在他的倡导下,各地县也开办了基层干部训练班。截至1948年秋,全辽吉地区培养提拔了8000名新干部,后来大都成了建设辽吉根据地的骨干。

与此同时,陶铸始终重视各地委、县委领导班子建设。他在选配组建地县委领导班子时,总是胸怀全局,大公无私,体现了五湖四海团结一体的伟大气魄。1945年12月辽西省委刚组建时,陶铸从沈阳带出一批政治上较强的干部,当时已在辽西各县工作的同志认为,由这些干部接替他们,他们到下面去工作是理所当然的。问题提出后,陶铸坚决不同意,他根据各县的实际斗争情况,只留下王丹波一人担任法库县公安局长,其他所有同他一起来的同志都下到区里担任书记或是区长。在此之前,一地委曾决定调法库县委书记于之随易辰到二地委工作,由陶铸带来的薛光军担任法库县委书记。法库县委同志得知后提出不同意见:“法库地处沈阳外围,是敌我拉锯地带,经常有战斗,配备干部要适应这种战争形势的需要。于之同志经过八年抗战,又抓

过武工队工作,留在法库工作比较合适。”陶铸采纳了这个意见,于之继续担任法库县委书记,薛光军担任县委副书记。在选配各级领导班子时,陶铸总是知人善任,用其所长。1946年10月,辽吉地区斗争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。为了打开一分区斗争局面,省委领导反复研究一分区司令员的人选,最后陶铸认定赵东寰是最佳人选。于是他找赵东寰谈话,着重讲述了坚持一分区斗争任务的艰巨与光荣,从政治上激励赵东寰,使之深感组织上的信任和期待,毅然接受了去一分区的任务。赵东寰到一分区后,率领部队与敌人针锋相对,反复较量,在康平打了两仗,在法库打了四仗,前后歼灭敌人几个团的兵力,很快将一分区的斗争局面打开。

在创建和坚持辽吉根据地的过程中,陶铸始终重视根据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,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和组织的整顿。1946年10月以后,由于敌人大举进攻,辽吉一、二、五分区大部分变为敌占区或边沿区,少数干部有畏难情绪,甚至有极少数同志企图逃避残酷的战争要求到后方去。对此,陶铸在干部会议上,反复讲解坚持辽吉斗争的重大意义及其有利条件,教育干部坚定信心,同时也批评了企图逃避斗争、畏缩不前的消极悲观情绪。会上他组织讨论,整顿思想,鼓舞干劲,会后省委发出《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决定》,对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、自由主义、组织涣散、纪律松弛及贪图享受、贪污腐化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组织处理,从而为打开一、二、五分区的斗争局面,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。

1947年10月中央《土地法大纲》公布后,为贯彻落实土地会议精神,辽吉省委又做出整编队伍的决定。陶铸召开民主会议,听取省直机关和部分地县同志对省委常委的意见,代表省委作自我批评,并认真加强对整编运动的领导。他特别强调“纯洁组织与争取知识分子缺少哪一方面都会发生偏差错误”。这次整编队伍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,也出现了一些偏差,在解职交权中曾伤害了一些同志。在纠正偏差时,陶铸与被整错了的同志谈话,从而使得一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感到党的温暖,也使一些领导干部受到一次党的政策教育。

在东北解放战争中,陶铸始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,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。他平等待人,富于民主精神。他善于团结教育干部,诚恳坦率,能与干部倾情交心。他曾坦率地向一些地县委领导同志讲:“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容易‘左’,你们在我领导下工作,要注意这个问题。”这些话使干部的心与他的心贴得更近了,肯于向他讲心里话,在工作上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与他争辩。他对干部工作要求是严格的,特别是对干部思想作风上的缺点从不放松批评,但更多的是从正面进行教诲。他常用现身说法启迪那些在对敌斗争中畏缩不前的人。他说:“我到东北来是准备献出一切的,如果我牺牲了,只要在我的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陶铸几个字我就别无所求了。”他的话,他的心扉,特别是他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和实际行动,触动了激励了许多同志英勇奋斗。

(六十)

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二十二——

翻 车

●张柏春

翻车,又称龙骨车,是链传动的刮板式水车,适合于低扬程提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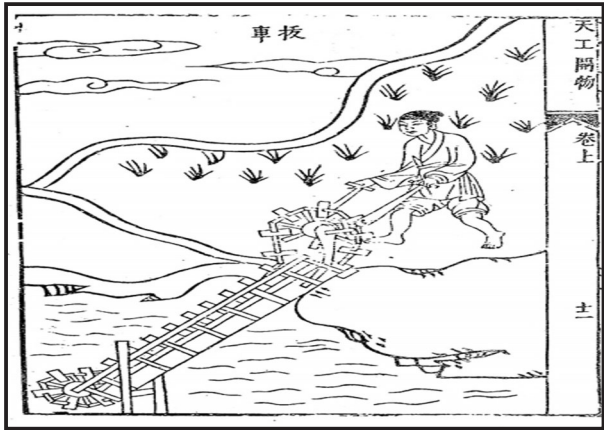
据《后汉书·张让传》记载,公元186年毕岚制作翻车、渴乌,用于道路洒水。三国时期,马钧制作了用于灌溉的翻车,就连儿童都能操作这种水车提水。马钧制作的翻车也许是对东汉时期翻车的改进。在公元九世纪中国人已经在使用手转、足踏和牛转三种驱动方式的翻车。

手转翻车是靠人力操作的小型翻车。如1637年宋应星在《天工开物》中描绘的“拔车”。车体主要是一个长槽,两端各架一个链轮。下轮为从动轮,部分置于水中。上轮为架在岸上的主动轮,轮轴两端各装一个曲柄,每个曲柄上套一个长杆。木链条(龙骨)挂装在两个链轮上,链条上的刮水板沿着长槽向上刮水。使用时,一人两手分别持长杆一端,摇转曲柄及主动链轮,将水提升到田里。

最为常见的是脚踏的翻车。北宋《耕获图》绘出了比较完整的脚踏翻车。元代王桢在《农书》里描绘了翻车的构造。它与“拔车”的差别主要是尺寸较大,以主动链轮的卧轴上的拐木为驱动装置。通常需要数人踏动翻车。每人扶或伏靠车架,两脚交替踏动一拐另木。

牛转翻车不劳人力,提水功效好。宋代绘画《柳阴云雁图》描绘了牛转翻车。牛拉转立轴及其上的大齿轮,驱动翻车的卧轴,卧轴带动链轮转动。大约从十二世纪开始,江浙地区就使用风车驱动翻车。风车驱动的翻车用于灌溉稻田,或沿海的盐场提水。

翻车适用于扬程不大的提水灌溉,或排水,或制盐,是中国各地长期广泛使用的提水工具。欧洲的阿基米德螺旋式水车与翻车有不同的构造,但提水的功能相似。



《天工开物》中描绘的“拔车”

成语故事



志厉秋霜:比喻品质高洁、心志壮烈。《晋书·儒林传·范弘之》:“志厉秋霜,诚贯一时。”范弘之(晋代人,曾任余杭令)雅正好学,精通儒业,为太学博士,为人正直,遇事直言不讳,“惟思尽忠而已”。他提倡节俭和礼、义、廉、耻,反对聚敛无度、奢侈浪费,心志高洁,为人所敬重。

林森/图文

志厉秋霜

读书要常温习

●纪一

读书全要体行

读书不在记诵,全要身体力行。若不身体力行,虽读书五车,究竟书是书,我是我,全不相干。夫圣贤垂训教人之意,欲令天下后世凡读圣贤书者,皆效圣贤所为。若徒以记诵辞章之学,幸取科第功名,不亦为圣贤之罪人乎?

读书切忌贪多

读书不在贪多,只要章句少而熟读精思,久而义理自然贯通。若或贪多则不熟,务博则不精,欲速反迟,此是学人大病。俗云:“贪多嚼不烂。”意正如此。

读书要时常温习

天下善读书者,不如善理书。书若不理,虽极熟之书,亦必遗忘,何况乎半熟之书乎?书若不理,虽有大聪明记性,亦必遗忘,何况资质庸常乎?所以读书既要勤勤熟读,又要勤勤熟理,则时复思绎,淡洽于中,而自无扞格难通之病矣;若或读而不熟,熟而不理,只是徒有读书之名,而无读书之实,不可谓之读书人也。

世上要紧须在耕读二事

人生在世,唯读书、耕田二事是极

要紧者。盖书能读得透彻,则理明于心,做事自不冒昧矣。用力田亩,则养膳有赖,俯仰无虑,即不能躬亲耕种,亦当专心督率。若不读书,何以立身行道,显亲扬名?若不耕田,何以仰事父母?何以俯畜妻子?唐人诗云:“天下良图读与耕。”要知一切事,总不如此二字之高贵安稳也。

书分四等

天下之书极多,予意约分四等:有宜熟读者,有只宜熟看者,有存备考核者,有切戒入目者。即如《四书》本经以及得意好文,嘉言法语,必须读而又读,熟记于心,更须时加温习,不可少有遗忘。至于后贤讲解,历代史鉴,以及事实典记,则选性,亦必遗忘,何况资质庸常乎?所以其语句紧要者记之,余则熟看,不必尽读,亦不能尽读也。再若韵府、韵端字汇、经济、医药、技艺等书,看充存之,以备参考。下而至于俚俗杂书,其中不独并无学问。凡遇此等书,不必入目。如此分别,才有见识。不然,藜藿先已饱满,后来虽有佳肴美味,反吃不矣,岂不可惜?

京通政使时,正值其母六十大寿,他在百忙之中回到老家湖口为母亲过寿。由于他官位高,影响大,除亲友为其母亲贺寿之外,许多下属和地方官员,也借贺寿之名,前来向许汝魁送礼,以图拉近相互之间的关系。一时之间,许府是宾客盈门、络绎不绝。许汝魁向来为官清廉,为了保持自身的清廉,又不扫了母亲的兴致,许汝魁想了个法子,先是收下了礼物,然后让宾客留下来一起共饮寿宴,在宾客离开之前,将礼物一一归还。是夜,许多宾客留下过宿,但是留宿的客人太多,客房不够用,于是他就在厅堂、厢房的地上铺上稻草,自己先在稻草上睡下,宾客见状也一一躺下,那晚,许汝魁就在草铺上与友人畅谈。后来湖口百姓闻知此事皆言:“许仰亭做官,乱草一铺。”

许汝魁勤政为民,为官清廉,政绩斐然,曾多次受到历府的嘉奖和赏赐,后来,许汝魁因患病卒于任上,万历赐祭葬,方志称其“有古大臣风”。

民谚中的许汝魁

●石静 张国强

曾任榆林兵备道,榆林地处明朝北部防线前,时有游牧部族进犯。许汝魁上任后,首先做好防御工作,率领军民开掘了数百里的边墙。有一次游牧部族进犯,全城文武官员惊慌不已,许汝魁镇定自若,召集军队,就在兵卒面前,许汝魁用剑向书案砍去,以此为誓,要求大家积极御敌,受此鼓舞,“三军奋臂先登,斩首数百”,许汝魁任此职三年,五战皆捷,边境安宁,百姓乐业。

湖口民间有这么一个传说:许汝魁在任南

许汝魁虽是一介书生,但在边疆做官处理军务时,表现出的英雄之气令人震撼。许汝魁

■ 我 看 我 说

网络文学如何走好下一个二十年

●赵明昊

近日,第三届中国“网络文学+”大会闭幕,这个会议给大众带来了不少惊喜。据媒体报道,2018年我国重点网络文学总体营业收入342亿元,主要网络文学驻站创作者达到1755万人。2018年各类网络文学作品累计2442万部,读者规模为4.3亿人。特别是在网络文学IP转化方面,大会发挥了良好的平台作用,自第二届大会以来完成219部网络文学IP签约,总交易额近7亿元。总体来看,网络文学产业正逐渐走向更高定位,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从现象、类型到产业、生态,网络文学至今仍充满生机活力,关键还在于不断地深化内涵、拓展外延。野蛮生长时期,网络文学“流量导向”特征明显,大量修仙、穿越、灵异等题材作品涌现,这种“爽文”虽然过瘾,但显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。在进入市场化运作并构建日益健全的监管体系后,网络文学才真正迎来了飞跃。当前,网络文学作品的生产有着明确的价值导向,通过竞争与筛选,高人气有口碑的IP无一不是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俱佳并得到多方认可。

不过,虽然网络文学产业已经步入健康持续发展的道路,网络文学作品也逐渐量质齐升,成为中国文化扬帆出海的一支重要力量,但从“高原”迈向“高峰”之路依旧坎坷,需要从业者为之思考并努力。其中,尤为需要关注的是市场化力量的“双刃剑”作用。文化发展有着独特的逻辑,虽然扎根于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,却也并不完全依赖于这一因素。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,都有着明显超越文字、故事、类型本身而可以凝练为艺术的东西,这恰恰是由利润驱动、工业化生产、商品化销售的文化产业所排斥的。当一项具有艺术特质的创作工作被置于商业逻辑之下,它就很难逃避标准化的规范和大众口味的挑拣,文学作品中关于揭示、反思、批判以及回应时代问题、实现心灵解放等诸多特质则可能遭到侵蚀。我们需要认识到,迎合大众口味和消费主义绝不是人民性、时代性的表现,反而是网络文学自身异化的标志。

当然,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野在于互联网这一新事物,它具有的开放、包容、平等和大众化等诸多特点,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多样选择。在这种环境下,创作者可以找到群体归属,时刻面对观点和意见的挑战,在多方彼此呼应的过程中不断升华文字,不过这有赖于创作者本身的心体智识是否强大。正如有人开玩笑地讲,金庸作品大多是“爽文”,堪称网络文学“鼻祖”。但他之所以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大家,还在于金庸的小说之中不仅限于对武功的想象、侠义的称颂,还有对自身的关切、对命运的思考、对社会的认识,将“武侠”类型文学进行了重新解释,这才让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品。

中国网络文学走过了21年发展历程,人们对它的未来充满信心,对它的期盼也越来越高。如何能走好下一个20年,除了不断保持对既有政策和模式的支持外,还需要秉持更加宽容的态度、构建更加宽容的环境,让创作者有时间和空间成长、成才、成为大家。